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王晓文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关键词]大文学史观;现代;民族;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8)03-0049-04

文学史是涵括文学和历史的复合体。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因此在突出其文学性的同时,还要着眼其“史”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和文学的结合点上寻找出构建文学史的最佳理论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界影响比较大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王瑶先生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范之作,显示出中国新文学史所取得的文学史学成就。这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各自带有自己的写史特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写史纲领,依照《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革命四个分期的论述将文学史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时期,《史稿》都是按照文艺运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这样的结构进行论述。“《史稿》所建立的体系以四个发展段落的顺序为经,以题材分类为纬,交相编织而成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史著体系”。^[1](p46)]这部文学史开创了新文学史写史的典范,而且这种构建格局影响了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史规范。后来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大体沿用了这种范式。如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延续了这种写史格局。不过《史稿》还是有它的缺陷,囿于时代的局限,整部《史稿》视野不够开阔,政治化过浓。《初稿》也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写史的理论指导,整个文学史更像一部政治史,文学的意义淹没给政治的需要和规范中。值得指出的是这部文学史仍然在浓厚的政治话语的规避下体现了一定的个人写史风格。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较《初稿》而言政治色彩大大淡化,但阶级斗争的味道依然较浓。虽然以上所列的文学史都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新文学史的风貌,各有千秋也各有自己独到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依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有某种缺憾。毕竟时代不同了,在远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下,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和大历史的视野来对待前人留下来的宝贵文学遗产,以敏锐的文学嗅觉和宏阔的历史魄力来构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大文学史观就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文学放置在大的历史平台上来审视,用客观的历史眼光和大文学的视野,兼顾文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样貌尽量还原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中,站在文学艺术的立场上,回到文学本身

将历史展现出来。历史是一团迷雾,文学史的写作就是要拨去迷雾,尽量还原历史和文化原生态的文学建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新文学的构建就要在文化生态的多元勾连中突出其时代文化特征来。

18世纪末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现代性的潮流就在全世界蔓延。实现现代化,体验现代性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从词义看“现代”这个词就可以看出与“古典”相对立的姿态,体现出一种新生事物的锐气、霸气和张力,“表达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2]换句话说没有古典就彰显不出现代的魅力来,也就是说现代与古典是一对历史的范畴而非单纯的价值评定标准。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史。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间,“现代”似乎已经是20世纪的神话。新的世纪,“后现代”不仅是与“现代”对立的新宠而且似乎成了终结“现代”的“寓言”。不管理论家们对“后现代”是如何的吹捧,本文依然持“现代”的立场。因为,“后现代”也不过是“现代”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延伸。“利奥他一再强调后现代其实是现代的初生阶段。”^[3](p6)]强调现代/后现代的对立并无意就这两个概念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只不过为了表明文章的论述立场。在新的历史维度上来重新编写新文学发展的历程是很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这个命题是在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适应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和整合的过程。新文学史的编写在某种程度上是掺入主观认知与审美体验的对历史有选择的改编和再认识的过程。因为文学史的建构是一项综合的工程,涉及到文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势必要牵扯很多问题,历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的理论界定,还有就是具体社会现状和整个的时代氛围对文学史的影响等等因素,而且在这其中采用何种标准和主导思想是影响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一环。因此秉持何种文学史观将会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对文学与历史能否做出客观评价等作为一部成熟文学史的关键性问题。另外文学史的写作非个体化的建构,极易受到学术思潮、文艺、社会主流政治和文化思潮

的制约,即便是个人化的写史,也难以冲破当时的时代语境来构建起独立的话语系统,更难以突破时代所达到的总体氛围,因此成熟的文学史建构就要在一种宏阔的视野中进行而非囿于某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展开,这就要求有一个维度,有一种态度和理念,本着较为客观的大历史的气魄来抒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坚持大文学史观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局限性而提出的观点。大文学史观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也是一种主观态度,是在文学的现代性体验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构建的历史背景中提出来的。在现代性话语系统的构建中重绘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版图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人类在穿越了历史时空走向“后现代”的今天,“现代”仍然具有它的魅力。它在时间体验的历史维度上给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出发点。它既作为与古典相对的历史意识那么在写作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现场感与文学的尽可能的原生态化。上个世纪出版的几部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史如钱理群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杨义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采用在一章结束或在全书的末尾都附列上本章或本书所涉及年代发生的文学大事这样的方式,试图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历史现场感,让读者置身于历史的“真实”中去触摸历史毛茸茸的边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历史的现场感,让后人徜徉在历史的发生态中寻找文学的真意。后人是在对历史的敬畏和好奇中小心翼翼地敲开紧扣着的历史大门,对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知识考古才会尽可能的发现历史的真实面目,如果只凭主观猜测那将造成“历史的缺失”,因此追寻历史的原生态是不可或缺的。文学史可以说是以一种“过去的现在”状态存在的。建构大文学史就是开掘出以往没有的文学史实和现象,找到曾经被历史遮蔽或者因思想局限所导致的文学史空白点,纠正主观臆断和时代困扰下造成的理论和史实误区。在这个过程中,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嗅觉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发掘相对于发明创造来说更多的是理论经验而非想象。此外,运用行之有效的理论范畴会发现更多文学新景观。

在对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还牵扯一个接受的问题。相对“现代”,历史是“过去时”,因此过去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要走进我们的视野必要在知识考古的过程中接受他们,“一种新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句话说,它已经就是我们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的调整”。^{[4](p12)}接受就是一种拿来为我所用的过程,在这里接受的程度和限度会受到治史人自身的认识水平,学养内涵,文化背景和具体的社会语境的牵制,但是如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的传承有一种无畏的奉献精神,在大文学观思维的主导下寻找和发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真相,本着审美的原则去发现存在在历史中间的文学史实,将这些文学史实进行有效的过滤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原生态化的历史文献资料。当然,持客观的历史态度并不是说将文学史料原汁原味的一一罗列堆砌起来,形成毫无章法可言的流水记帐本,那样做的恐怕不需要浪费那么的精力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打开电脑轻点鼠标,一切就会呈现在眼前了。面对着历史,作为后来人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应当以何种理由来保留和去除那个时代的文学精华和糟粕这是

后人需要深思熟虑后再付诸实践的一个过程,并非采取过激的一切都抛弃掉的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将历史片面的看作是文学想象的产物,在主观臆断中对历史进行肆意的歪曲和美化。所以建构我们时代的文学史应该持大文学史观立场对文学史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建构。应该以历史和时代的眼光和气魄进行大胆的探索,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发展、改编进行有效的研究,以现代人的勇气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历史永远是变动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需要,每个史家都有每个史家的性情”。^{[5](p130)}历史的召唤,时代的需要,文学的体验促使文学史家们在对以往文学史作出客观合理评价的同时建构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学史。“历史永远没有办法写出所谓的最后定本”,^{[6](p130)}所以建构具有现代品格的属于当下时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很有必要的。

二

建构现代品格的大文学史需要大文学史观的治史思维,具有历史的包容性和涵括力以及文学审美的独有发现。它同时要求治史人有甘当人先的学术勇气和冲破前人既定规范的魄力,形成独到的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范式和理念。既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生成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文学和历史因素的辨析、淘汰、取舍和保留的过程,那么在这个综合的形成体中应当有一个明确理论范式,也就是有一个文学史内在的理论标准将文学史的诸多方面糅合在一起。将文学和历史在“现代”这个大历史文化生态语境下艺术的结合在一起,完成大文学史的构想。这些需要大文学史观作为前提。作为现代人应当有我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解读,沿着岁月流逝的痕迹去寻找历史的本来面目。探寻历史就是向历史追问,利用现代的思维对历史考古。大文学史观的设想将会极大的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范围,而且还将开发出不少意想不到的文学史实、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在大文学史观的写史思想指导下能够廓清一些长期以来因分期不清而导致的对文学源流问题的界定。比如对现代中国文学起点的定位究竟是应当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还是再上溯到晚清的某个时期,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和理论界定。王德威作为海外汉学研究佼佼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眼光和理论发现,他的论述并且影响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方向。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将晚清文学重新定位,提出“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7](p16)}他从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角度将新文学的起点提到了晚清。打破以往文学史一直将“五四文学”作为开端的理论定位,开拓了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新领域。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现代文学的起点究竟该如何确定,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算不算真正的新文学开端的标志,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有向历史考古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就是要求有大文学史的理念来处理这些曾经在文学史中被既定的标准规范定型的问题。对现代性的体验与追求是现代中国文人一直在努力的事业,这种向西方靠拢的渴慕心态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叙事和想象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救国方案。那么对这种现代性的企慕心态正确定位和表达是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要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看王德威的提法不无道理。另外大文学史观的理念要求文学史家具

有中国大历史的气魄和执著着文学的实际进行文学史构建的学术能力,能够解放思想,以多元的思维来考察和解读历史曾经赋予文学的积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这个命题不单单是打通各个时期文学更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他们这样来定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8](p11)}这个命题突出强调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审美品格试图在现代的时空体验中对中国新文学重新把握与考察,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本着大文学史观的思维模式进行文学史的建构。从时间界面上看这部文学史就显现出一种大文学史的气度,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放置在一个大历史维度上来审视和书写。这部文学史也没有将惯常的新文学的分期定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而是从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问题格局的开创和初创,新文学文化、审美基质的初步呈现以及翻译文学热潮的出现和中国文学世界化趋势的启动等四个方面来论述新文学发生的开端应该定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9](p21)}突破了原来一直使用的文学史的分期标准,而且港台文学也加入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范畴之中,体现出一种相对宏阔的历史包容性和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大文学史理念。其实仔细研究一下以上所列的新文学发生的四条原因可以总结出这种分期方法的依据实际上和“二十世纪文学”的提出以及王德威所进行的现代性的追寻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追索“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外学者对新文学的发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识。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史的治史立场将会影响到文学的一些本质问题,这就更加需要大文学史的理论框架来处理 and 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发现更多更有研究价值的文学历史资料进行更切实的文学研究。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日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促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现代化转型,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所以有学者提出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理论依据来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开端上溯到晚清时期。^[10]这种分期方法也是一种大文学史观的治史思维。在一种较为开阔的历史思维指导下,从政治和经济的两个层面上关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文化文化方面沿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构想展开,在现代性的追索和焦虑中开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探源。这种思维模式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又一新的理论构建,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创新性和延展性,在现代性这个论述框架中又有了操作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举的几种大文学史的理论思维和文本实践虽然都不同程度的开拓或者改变说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模样,但是都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很好的兼顾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史实,缺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仍然是在汉族文学的思维主导下来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这样势必造成现代中国文学史不完整的呈现。

三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存在诸多的文化形态,民族不同文化就不同,反映到文学上也会呈现出各异的文学样态,因此就需要有文学整体观的思维指导,兼

持大文学史观的写实风格,将各民族文学放在大历史的平台上来审视,以体现民族—国家的完整文学格局为努力方向,书写出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借用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式考虑到可以在地域上将现代中国文学串联在一起,但要充分兼顾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意义,将以往文学史忽略的少数民族文学也纳入到中国文学的大版图中。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进程中,随着疆域版图的变化和分化,中国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也呈现出各异纷呈的多元文化局面。在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交流融会过程中,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有了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可能,体现在文学中就是文学创作形式、形象体系、文学内涵和文学语言的丰富多元化的立体交叉格局。在这种繁复的多重旋律中,如何甄别出有审美价值和具有文学史收录意义而且能够体现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可能的文学史实是很关键的。汉族文学没有史诗的记载,但蒙古史诗《江格尔》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他们填补了中国文学史诗缺位的空白。这些史诗不但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他们摒弃在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是不合适的。虽然这些史诗是属于古代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但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后世民间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从大文学史观的立场看,古代和现代并非全面断裂,而是有传承和延续意义的。占主流地位的汉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力与中国文化超稳固的结构形态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交流融会中更多地呈现出汉化的趋向,在汉民族文化的引导下消解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但是这种文化的趋同性并没有完全终结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如同上面所说的三大文学史诗以及阿诗玛等民间神话传奇等同样也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创作就是以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湘西边地纯净优美的诗化田园和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从而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这一个”。老舍、端木蕻良、李辉英、张承志、雷达等这些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一定位置的作家都是流淌着少数民族文化血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1](p391)}鲁迅先生的话对大文学史的构建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兼顾少数民族文学不单单是将那些已经在文学史上成名的文学家挖掘出来也要考虑到那些攫取少数民族文学精华并将这种精华融会贯通到文学创作中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家,如果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但凸现出本民族文学的特点而且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就要考虑纳入到文学史的构建中。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汉族文化来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距,而且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民族大多生存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欠发达的边地,现代性的体验相对来讲也有了“体验的差距”,因此在“现代”的大氛围中将少数民族文学合理的呈现在现代中国大文学史的建构中将会是大文学史写作的重任。如何在文学史中体现出文化的平衡性和多元化这是新世纪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大文学史观的文学史书写应在现代中国版图上产生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等统统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作为考察的对象,摒弃以往奉行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兼顾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现象,在现代

性的叙述框架中对这些文学史实进行爬梳从中找出有文学审美价值和历史存留可能的文学精华,以宽泛多元的思维来处理这些文学板块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华大文学史。这种大文学史的建构着眼于在同一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当然构建大文学史并非对各民族文学平均用力,那些没有文学审美价值或者没有艺术观照可能的文学样态是不能进入文学史写作视野的,要在突出重点选取特色的理念下来完成文学史的书写。基于汉族文化的包容性和主导地位将选取汉语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语言。不过理论的科学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将会是横亘在这个设想之上的最大障碍,需要阐释清的问题很多,不过笔者仍然相信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总会得到合理解决的。

另外大文学史观的理论思维对解决学界谈论的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统一起来的问题,也有了学理的可能性,甚至是古典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打通也有了一丝曙光。近年来在学界讨论比较频繁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现当代文学打通的问题。如何打通,以什么样的标准和理论范式来进行合理的操作,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利用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式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治史标准来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期壁垒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因为不管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都是在现代文化氛围内,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生成的文学,二者有相对合理的统一的理论前提和衡量基准。当然要想完成这些理论预设的关键是在大文学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现代中国文学的再整合。

拥有大文学史观的文学史生态思想将会在纷繁

复杂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保持一种旷达的心境和学理思维,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进行文学史的写作会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观感和文学再创造的意境。用一种较为超越的历史眼光对文学史进行符合现代要求和历史现场感的编撰。

[参考文献]

-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撰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转引自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4]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5][6]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A].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
- [7]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8]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漫谈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9]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 [10]朱德发.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J].福建论坛,2002,(2):73.
- [1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王云江]

Cultural eco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deas on great literatur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Xiao - wen

(The Literature Schoo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featuring eco - civilization, the differency and diverse of literature shall become an eco - no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the text comes up with some ideas on the history writing notion in the great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text, with "modern" as the platform,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to improvement and adjust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netioned minority litenevture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Reriod to constitute a relatively complete great Literature history in China under the eco - perspective.

Key words: great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modern; ation; constitute

(上接第43页)

On the validit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 court

LI Xiao - xia

(Law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Legislation Law" that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 Court. In fac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legislation law is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rrelative articles of correlative laws, such as Organic Law of the People's Courts, provide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validit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focus of study should be on how to exert the power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not on questioning ist validity.

Key words: legislation law;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validity